

中国经济转型的财富分配效应

On China's Income Distribution Issues

文 田国强



社会公共服务指标应成为硬约束，这就要求政府要少伸“掠夺之手”，多伸“援助之手”，采用“无为之手”，让财富更多地流向百姓而不是政府自身，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。

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正在认识到，中国经济转型已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命题，需要经济体制、政治体制、社会体制、文化体制的联动改革和综合治理。当然，这是从宏观的视角得出的共识，那么从微观的视角来看如何推动和检测中国经济转型的进度呢？

不妨以均富为目标、从财富分配效应的角度来加以考察。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持续高增长，社会总体财富的“蛋糕”快速变大，但是国民财富分配格局的不合理却日益加深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一是国与民的收入差距拉大，我国居民收入比重由 1988 年 70.5% 下降至当前的 43%，国家财政收入在 1994 年至 2011 年之间增加了近 20 倍，而同期 GDP 仅增长了近 10 倍，政府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的好处远多于居民，且财政支出又大多用在推动 GDP 增长和自我消费上，而不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教育、医疗、社保、环保等事业上，使得老百姓捂住钱袋子不愿消费。

二是贫与富的收入差距拉大，2011 年我国基尼系数超过 0.5，使得社会阶层分化，在就业、养老、看病、住房、上学等方面没有基本平等的竞争起点，社会矛盾激化。

三是城与乡的收入差距拉大，我国居民收入之比由 1978 年的 2.57 倍增至 2011 年的 3.44 倍，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非但没有缓解，反而有固化和加剧的趋势。

上述这些财富结构的不合理布局与体制性制度障碍未破除，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滞后，政府、社会与市场的治理边界界定

不清晰、不合理，导致了重政府轻市场、重国富轻民富、重发展轻服务的“三重三轻”不科学发展观有很大关系。所以，下一步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是要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、市场和社会的治理边界。具体来看，我们需要思考以下几个关键问题。

第一是如何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。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，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和力度。社会公共服务指标应成为硬约束，这就要求政府要少伸“掠夺之手”，多伸“援助之手”，采用“无为之手”，让财富更多地流向百姓而不是政府自身，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。

第二是如何促进中产阶级的崛起。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是解决贫富差距的必由之路，也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。从某种意义上看，中产阶级是现代公司的产物，没有公司群体的崛起就没有中产阶级的崛起。反过来说，大量企业的倒闭，将会拖垮一批中等收入者。所以，关键还是政府要向市场让渡本属于市场的权力和权利，让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型企业力量充分生长。

第三是如何促进市场导向的城市化。要真正解决“三农”问题，只有让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大幅减少，而做到这点的唯一途径是坚持市场导向的城市化道路。好的农地制度可以使城市化的成本大大下降，使农民获得分享城市化带来的集聚效应和经济繁荣的权利和渠道，同时极大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。■

(作者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、高等研究院院长、著名经济学家)